

睢縣史志資料

总第五期

睢縣史志总編室

皓首丹心照汗青 目 录

修志人物

皓首丹心照汗青.....罗杰性、马俊勇(1)

地方史研究

潜庵学术思想浅论.....罗杰性(4)

睢州名人

蒋奇犹.....李良甫(14)

史志信息

《睢县志》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

.....罗杰性、高玉生(16)

说古道今

“官年”与“真年”

“书帕金”和“冰炭敬”.....左非(19)

县情汇编试写稿

睢县概况(1990年).....(21)

皓首丹心照汗青

罗杰性 马俊勇

——记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县史志编委会

常务副主任孔羽同志

孔羽同志是我县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。他从事语文教学三十多年，并长期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，德高望重，桃李满天下。孔羽同志文史功力深厚，治学严谨，虚怀若谷，奖掖后进，一生嗜学，老而弥笃，受到晚辈的敬仰。一九八一年，孔羽同志作为我县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，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一九八二年，全国性的编史修志工作蓬勃兴起，我县也于这年夏天经中共睢县县委批准，成立了县志总编室（现名睢县史志总编室），开展这项工作。当时这项工作还处在草创阶段，面临经费不足、人材短缺、办公用房拥挤等困难，尤其是大多数人对这项工作陌生，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存在着“县志修不修无所谓”的糊涂观念。甚至一些领导同志也不理解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历史和现实意义，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，支持不力，以至于县志总编室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工作进展缓慢，无实绩可言。为扭转被动局面，县委、县政府于一九八三年秋季对县志总编室进行了调整，加强了领导，充实了人员，并初步解决了经费、用房等问题。同时决定由孔羽同志分工抓修志工作，担任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。孔羽同志义不容辞地欣然接受了任务。从此，我县的修

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一九八四年春，县级机构改革，县志总编室进入政府序列，县志编纂工作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孔羽同志在这一时期为新县志的编纂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他事必躬亲，从新县志的总体设计，篇章布局，到篇目的具体拟定；从搜集资料，整理资料到试写初稿，他都和总编室的同志一起坐下来认真研讨。他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指导性建议，帮助解决了修志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学术性疑难问题。总编室的大多数同志是由行政工作改行从事修志的，开始对业务不够熟悉。孔羽同志就像当年在学校里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，谆谆教诲，耐心讲解，帮助同志们提高文史水平和编辑、写作能力。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，新编《睢县志》先后完成了第一、二、三稿。每一稿完成后，孔羽同志都逐字逐句精心审阅批改，连一个标点符号不妥也都认真加以更正。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影响了总编室全体同志，大家决心尽最大努力提高志书质量，不愧对子孙后代。一九八八年夏，睢县遇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，而此时正值《睢县志》最后定稿的关键时刻。年届古稀的孔羽同志，谢绝外地亲友邀他前往避暑的好意，冒着酷暑，挥汗如雨，对志稿作最后的把关审定，一连数十天足不出户，夜以继日，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。当县志定稿进厂付印时，孔羽同志也因身心劳瘁，患胃出血住进医院。总编室的同志前往探视，孔羽同志躺在病床上，还仔细地询问志稿进厂发排的情况，一遍又一遍叮嘱要精心校对，以确保志书质量。望着他那清癯的病容和满头的白发，同志们的眼睛湿润了。一九八五年五月，我县、同时也是商丘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型志书——《睢县志》问世了，这部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志书，以它那精美大方的装帧，正确的立场

观点，独具特色的布局和体例，流畅的语言和翔实的内容，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好评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部成功之作也浸透着孔羽同志的一份心血和汗水。

整理出版旧志是这次编史修志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。睢县历史上文化教育发达，有着悠久的修志传统。据史料记载，从宋代到明清，曾多次修志。现存最早的一部《睢州志》修于明弘治十八年。目前尚能看到的旧志版本有四个，其中最为完整、内容最为丰富的是清光绪十八年所修《睢州志》。一九八四年秋，县志编委会提出，并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省地领导部门批准，决定将此旧志加以整理出版。旧志的标点、校勘等整理工作学术性很强，在当今睢县，这项工作非孔羽同志莫属。他在一九八四年开始着手，不顾工作繁忙，年迈多病，不分酷暑严寒，对这部近三十万字的旧志句斟字酌，精心标校，历时三年脱稿，油印后发送有关部门和人士征求意见。在商丘地区旧志整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旧志整理稿评审会上，孔羽同志的这项高质量的工作受到与会专家、同行的一致肯定。为方便阅读利用旧志资料，为经济建设服务，他还从现存的几种版本的《睢州志》中选取部分价值较高的内容，加上精当的标点注释，辑成近十万字的《旧志选注》。这两项成果一九八九经省地史志编委会的审查批准，合为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作为“河南省旧志整理丛书”的一种正式公开出版发行。新编《睢县志》和新版《睢州志》的出版发行，是睢县文化史上的壮举，是我县七十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也是孔羽同志对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。古稀余热献史志，皓首丹心照汗青，人们将不会忘记孔羽同志的出色工作。

潜庵学术思想浅论

罗杰性

汤斌字孔伯，号荆岬，晚号潜庵，是清朝前期理学代表人物之一，其学问事功，皆卓然可观，有清一代备受推崇，以至于在道光三年从祀孔庙，这是封建时代对学者的最高褒扬。不少人把汤斌当做治学为人居官的楷模，如咸同年间曾为礼部尚书的李棠阶，一生崇拜汤斌，晚年还手抄《汤文正公全书》，其学于朱陆无偏徇，惟主克己；身为高官而能清廉自持，居第衣服与寒素无异，都和汤斌相似，足见汤斌的影响之一斑。但是对汤斌学术思想的研究探讨，前人做的并不多。笔者不揣孤陋，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番讨论。希望能通过这一讨论引起学术界对汤斌研究的重视，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。

（1）民本主义政治思想

汤斌的政治思想植根于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。民本主义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际，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家学派的提倡下发扬光大，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。《尚书》中有“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；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”，《左传》有“国将兴，听于民”等一类说法。孟子更进一步发挥，提出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观点。古文《尚书》中的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是对民本主义的明快概括。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进步意义的精华部分，应加以肯定。汤斌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“天崩地

解”的时代，亲眼看到了民怎样变成贼”，“贼”又是怎样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朱明王朝。他的母亲赵氏据说是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，他对农民起义怀有仇恨，但他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并不只是浮浅地停留在仇恨和诅咒上，而是试图寻找原因。当然他不可能从封建制度本身，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上找到问题的答案，可他还是找到了导致“天下之乱”，民变为“贼”的直接原因，那就是被统治阶级的饥寒交迫，并把这一原因同统治者过度的聚敛财富联系起来。他说：“天下之乱始于饥寒。为政者谋其衣食，而俾无失业，则民不生心矣”。他做皇太子的老师，给皇太子讲的第一课，就是陈述《大学》中“财聚民散”之义，想使这位未来的最高统治者接受他的观点，成为一个“敬德保民”的有道明君。康熙帝问皇太子：“你的老师教了你什么学问”？太子便把汤斌讲的那一套说了。康熙帝颇不以为然，认为《大学》上讲的是春秋列国分疆时的事，那时一些国君横征暴敛，老百姓逃亡到邻国，如今海内一统，“民散”到哪里去呢？便吩咐太子用他的话问一下汤斌。太子向汤斌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汤斌于是详尽地讲了自己的观点，并列举了秦、隋两代土崩瓦解的例子，进一步指出海内一统而发生“民散”，其祸更烈于列国分疆时。民是封建统治的本体，因而必须对这个本体加以培护，才能使封建统治稳固。汤斌的“诚心爱民”，为民请命，就是从这一民本主义立场出发的。他认为统治阶级聚敛财富不能竭泽而渔，超过限度，否则民“生心”而“散”势必会导致封建统治的崩溃。这是汤斌在民本主义思想启发下，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。从客观上讲，节制统治阶级的欲望，使直接生产者安于衣食，当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，特

别是对于清初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残破亟待恢复的时代，更是如此。汤斌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因此也具有进步意义。

（2）理学上的拆衷主义

中国的思想界被理学统治了几百年，而理学内部的宗派门户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。宋明理学基本上分为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两大派。学者不主程朱，便入于陆王。两派之间，每一派内部由于渊源师承旨趣不同而形成的门户之间，互相攻击诽谤甚至谩骂是家常便饭。有这样一则笑话：甲乙二人相骂，甲骂乙“欺心”，乙反骂甲“欺心”；甲说乙：“你没天理！”乙反过来说甲：“你没天理”。一位道学先生听罢对弟子说：“此讲学也。”弟子很诧异，问：“这分明是在相骂，何以说是讲学？”先生回答：“说‘心’说‘天理’，不是讲学是干什么？你看如今讲学的人，那个是和睦的？”形象的刻画出道学先生们入主出奴，互相谩骂的嘴脸。程朱一派因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，往往以正统自居，自己偷窃佛道两家的思想资料，却大骂陆王派“近禅”为离经叛道。陆王一派虽地位下于程朱，但也拥有很大的市场和众多的拥护者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，王学异军突起，风靡天下，骎骎乎驾于程朱之上，有并吞包举之势。王学末流，弊端百出，学者往往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，脱离实际，为世诟病，故清初诸大儒如黄梨洲（宗羲）、顾亭林（炎武）等起而倡导实学，思想学术界始发生革命性变化。汤斌生于明末，主要政治、学术活动在清初，故亦受时代之限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《汤子遗书》提要谓“斌之学源出容城孙奇逢，其根底在姚江，而能持新安、金溪之平。大旨主于刻励实行，以讲求实用，无王学杳冥放荡之弊。”基本上是允当的。他

早年受王学影响，后来感到王学空泛，不踏实，故又入于程朱，对两派都有所取。中年从孙奇逢游，受其影响，最终形成了自己在理学上的折衷主义立场。孙奇逢原来也属于陆王一派，晚年向程朱靠近。他“病世之辨朱陆异同者不知反本”，著《理学宗传》一书，以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、薛瑄、王守仁、罗汝芳、顾宪成等人为理学“正宗”，于是理学“门户泯然”。孙批评“世之学者不务躬行，徒腾口说，徒增藩篱，”无补于道。汤斌谨守师说，也反对后学专为先儒辨异同而不去身体力行，斥为“玩物丧志。”他说：“先儒之言，都是自己用工夫体认过来，无一句不是实话。总之，源头澄澈，随时立教，不妨互异，正当反求诸身，识其所以同者，勿向话头讨分晓得”。又说：“近代濂洛关闽及河东姚江诸大儒，绍千载不传之绪，虽风会所值，指授各殊，而道本于心，先后若一。”也是调和折衷，一泯门户。和汤斌同时代的学者中，尊奉程朱，排斥陆王者很多。如陆陇其，专守程朱，攻陆王不遗余力。清初对王学的非议，甚至影响到《明史》为王守仁立传所持的基本态度，即褒贬何者为主。汤斌是主张以褒为主的，而明史馆中大多数人意见相反。王世禎《池北偶谈》中有一则说：“王文成公（守仁）为明第一流人物，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。康熙中开明史馆，秉笔者訾敖太甚。亡友叶文敏公（方蔼）时为总裁，予与之辩论，反复至于再四。二十二年四月，上（康熙帝）宣谕汤侍读荆岷（斌），令进所著诗文，且蒙召对。中有《王守仁论》一篇，上阅之，问汤意云何？汤因对以王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，且言守仁直节丰功，不独理学。上首肯曰：‘朕意亦如此’。”今《明史·王守仁传》褒过于贬，恐怕和康熙帝汤斌君臣之间这次谈

话有很大关系，汤斌可谓有功于王守仁。所言守仁“致良知”和朱子不相“刺谬”，亦为调和之说，非确论也。陆王心学近禅，汤斌对禅学也不疏远。他曾经手抄《阿弥陀经》，“有见之者谈及陈白沙（献章）、王阳明（守仁）之学近禅，公徐曰：‘今有穷禅客亦自住’。”虽然说汤斌折衷于程朱与陆王间，但我们觉得他更倾向于陆王。试看他与其门人论学的几段语录：

“人一身内浑是天理，于此便见人性皆善。人能随事体察，勿亏此心，本体无为所不为，无欲所不欲，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工夫。”

“圣贤学问，只在心性上用功，譬如种树，日于根本上培养灌溉，久之自然畅茂条达，根本自在。今人只在枝叶上用功，外面极好看，究之全非自己所有。”

“先儒有言顿悟之非‘不知悟未有不顿者。但学问真积日久，方有一旦豁然大悟处，是顿因于渐也。古人由悟而悔，由悔而悟，真实用功，一旦憬然醒悟，浑身汗下，透出本来面目’。”

把“心性”之于人比作根本之于树木，提倡培养“心性”，然后实现“一旦豁然大悟”的境界，这些说法和陆九渊的“养心”之说及禅宗南宗“顿悟成佛”之说接近。程朱与陆王虽然在哲学思想上存在较大分歧，但二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却是趋同的。二者所要论证的都是封建制度的合乎天理和永恒，异曲同工，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。这是汤斌在两派之间折衷调和的前提和根据。他不在为先儒辩异同上花费气力，而是把身体力行当要务，实在要比那些专辩朱陆异同，空谈性理的人高明。

（3）对《明史》的贡献

清修《明史》前后历时六十多年，有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贡献，连在林下以遗民自居的大学者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也对《明史》的纂修寄予了重视和希望，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以施加影响。黄宗羲还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和学生万斯同，参与纂修工作，特别是万斯同，对《明史》贡献甚伟，前人多有提及，此不备述。汤斌也是对《明史》作出过较大贡献的学者之一。

顺治二年清王朝即诏修《明史》。但终顺治一朝及康熙十八年前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并无实绩可言，只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。也有过一些关于史法的议论。在这些议论中，汤斌关于应为抗清而死的前明诸臣立传予以表彰的意见较为突出。顺治十二年，刚由庶吉士散馆（毕业）进入国史院为检讨的汤斌，年轻新进顾虑少，在《敬陈史法疏》中就这个在当时属于敏感性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“宋臣欧阳修纂《五代史》不为韩通立传，后世讥之。《宋史》修于至正三年，而不讳文（天祥）谢（枋得）之忠；《元史》修于洪武二年，而并列丁（好礼）巴（颜布哈）之义……（我朝）元、二年间，亦有未达天心，徒抱片节硜硜之志，百折靡回，虽逆我颜行，有乖倒戈之义，而临危致命，实表岁寒之心。比与海内浑一，窃名叛逆者情事不同。伏望皇上以万世之心为心，焕发纶音，概从宽宥，俾史臣纂修，俱免瞻顾”。疏上，触怒了由明朝大臣变节投降清朝的大学士冯铨、金之俊等贰臣。他们指汤斌此番议论为“夸奖抗逆之人”，拟严旨申飭。其时南明永历政权仍据有云贵一隅，韩王政权自保于川东一带，清王朝尚未完全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。汤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似乎有点不识时务。但他的这番议论却受到年轻有为的顺治皇帝的欣赏，特将汤斌召到南苑，“温谕移时”，认可

了他的意见。后来修《明史》时，由于汤斌先前的议论得到顺治皇帝的认可，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忌讳。于是大批明末清初因抗清而死的忠臣义士在《明史》中得以立传。

康熙十八年三月开博学鸿辞科，以延揽名士与遗民，中一二等者俱授翰林院编、检、讲、读之职，入明史馆预修《明史》。汤斌以一等授侍讲，居史馆二年，其间的成绩是纂成本纪、列传、历志等稿共二十卷，即今存《汤文正公遗书》中所收《潜庵先生拟明史稿》。二十一年六月，汤斌以侍读之职奉旨总裁《明史》，分任《天文志》、《历志》、《五行志》及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五朝列传的修改校订。直到二十三年六月奉命巡抚江苏时，这项工作仍在进行。其子汤溥说他工作十分勤勉，“考订期于确核。时方酷暑，汗流浹背，不懈也”。他在史馆中，遇到疑难问题，除和同馆中人商榷外，还不止一次写信向黄宗羲、顾炎武等请教。他对黄尤推崇，曾说：“黄先生论学，如大禹导水导山，脉络分明，吾党之斗杓也。”史馆中曾就《明史》中是否仿《宋史》之例，别立《道学传》一事发生意见分歧，著名学者朱彝尊力主别立，汤斌反之。最后汤斌当众拿出黄宗羲的来信，其中有论谓《宋史》立《道学传》为元儒之陋，《明史》不当沿袭其例，于是议论乃定。他曾一连两书寄顾炎武求教，今《亭林文集》所收《答汤荆岷书》，即为汤斌两函之答书。书中谈了顾炎武个人对明初一些史实的看法，特别是其中关于《太祖实录》多次重修的事实，十分重要，后之论明初史事者往往称引。最后还如数家珍地向汤斌一一列举记载明末历史的重要参考书。汤斌不耻下问，虚心向前辈求教和黄、顾诸君子悔人不倦，启迪后学的精神，令人向往。

(4) 不尚空谈、躬行实践的学风

理学家们往往空谈性理以自命不凡。言行不一，学问与人品、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距离是大多数理学家的特点。与汤斌同时的一些著名理学家如李光地、熊赐履、徐乾学等人，就是一群言行不一的伪君子。康熙帝对他们人品也有所不满，但需要借助他们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，文饰太平，所以也予信任和重用。熊为大学士时“嚼签子”嫁祸同僚的丑闻，康熙帝都替他害臊。李光地最受宠信。但他早年“卖友”，中年“夺情”等行径都为人所不齿。徐乾学善搞阴谋，和李光地争宠相轧也是人所共知。李光地晚年著《榕村语录》续编揭了徐不少老底。其中有一段说：世人知道汤潜庵是被明珠、余国柱所害，实际上是徐乾学暗中搬弄是非，做圈套加以陷害的。这一说法出于李光地之口虽不尽可信，但徐曾参与对汤斌的倾害，当亦是事实。比起李、徐这几个人来，汤斌显得木讷，忠厚有余，灵活不足，诗词文章也不如李、徐等做得好。但汤斌不喜标榜，不尚空谈，言行一致，高风亮节，光明磊落，实在是李、徐一流假道学难以望其项背的。这得力于汤斌平时重视实践，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和处处事事不自欺的修养。他在评价其师孙奇逢学术时说：“先生之学，以慎独为宗，以体认天理为要，以日用伦常为实际”。其实这也是汤斌为学的特点。他说：“为学工夫只在当下做。如今日为宰相，便有宰相当下该做底，推之他事亦然。”又说：“小人只是不认得独字。”在谈到读书的方法时，他说：“读书遇古人疑难大事，先须掩卷静思：如我处此何以措置？然后看将下去，方知古人得失。不然一直看下去，古人自古人，我自我，有何益处！”其子汤溥说他“笃志正学，潜心默证，内体诸心，外见诸

事，平易确实，不慕高运。于性命之渊微，造化之精奥，虽探讨穷索，而必以日用人伦为据。”大抵得其实。清初一些理学家喜欢立书院讲学，甚至见任官员也有创立书院，登坛开讲者。在江苏时，有人劝汤斌建书院，他说：“我不讲学，建书院何用。”闻有当道者登坛讲学，便慨然对门人说：“学当躬行实践，不在乎讲，讲则必有异同，有异同便是门户争端。当初孙夏峰为一代大儒，不曾应聘开讲，不过于一室中二三同志从容问答而已。若必登坛南面聚众而谈，何异禅门家数。”又说：“今人以讲学钓名，隳本业而长奔竞，吾未见其可也”，“尽吾职即学也”。在汤斌看来，官吏忠于职守，就是最好的学术，也就是他所谓的“今日为宰相便有宰相当下做底”观点。因而不重视讲学甚至著述。在林下时有人劝他著书，他说：“学贵日新，今之所是，异日未必不以为非，何敢妄为！”汤斌一生著述较少，和他的这些见解有关。虽然他的这些观点今天我们难以完全同意，但他倡导的不好高骛运，不尚空谈，躬行实践的学风，仍有借鉴意义。

还应指出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局限，汤斌思想中也包含有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内容。除上文已提到的他对农民起义所持的仇视诅咒态度等外，还可以举出许多。如他把“商贾”和“僧道辈”同等看待，一概斥为“游惰者”，主张将商人“驱而农之”，这和黄宗羲“工商皆本”思想及王夫之“富民大贾，国之司命”的见解相比差得很远。又如他承袭宋儒男尊女卑，歧视妇女的观点，说什么：“从来以女贾祸者不可胜数，然非旦夕之故。即如人家旧守家风，本无他事。乃忽动念为观之事，令女子读书习字，妄念一起，将必有受之者矣。”认为女子读书习字必然招祸，从而加以反

对，不用说是极为落后的思想，应该加以批判。批判地加以继承，正是我们今天研究汤斌思想应采取的态度。

引用书目

《汤子遗书》

《汤氏家谱》

《睢州志》

《先正事略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《明儒学案》

《池北偶谈》

《亭林文集》

《鲒埼亭集》

《宋学渊源记》

《旧闻随笔》

《十三经注疏》等

蒋奇犹

日修月改

李良甫

蒋学新

蒋奇犹(1618——1689)，字壮其，号半坡，睢州城内人。少年丧父，事母至孝。天资聪敏，过目成诵，幼称神童。弱冠补博士弟子员(即秀才)。清顺治三年(1646年)举于乡(举人)。他为人忠贞廉朴，不出仕为官。兄弟八人，子侄二十六人，皆以耕读为本，虽富有不用奴仆，家务由兄弟子侄分管。他常年食粗饭，穿布衣，生活十分俭朴。一生义捐乐赈，躬行十善，名贯睢州。

1、施粥赈荒：清顺治十七年(1660年春)，睢州境遭遇奇荒，米珠薪桂，州人告急。他即将历年积谷千石，开仓赈济，设粥厂于州城东门外同善寺内。施粥百日，日就食者三千人，病者医之，死者葬之，活人以万计。小麦将熟，每人赐给镰一把，草帽一顶，遣之返家收麦。

2、筑路通商：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，知州陈应辅想在城内起集市，因州城东门到水口三里许水深尺余，四方来人难以行走。他应州牧之请，慨然率佃户七百多人在水中垫路三里许，又垫鞍子岭南北路八十余丈，并垫东西大街路百余步，使商旅通，集市成。州人为此立下了蒋公路石碑。

3、施米放赈：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秋，淫雨霏霏连月不开，睢境内平地水深数尺余，禾苗淹没，六粮绝收。次年春大

饥，他从春正月起到三月止，远近乡邻，各以斗升计之，共放赈三千余石，乡民得活者万人。

4、堵堤捍城：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夏），黄河在金龙口决口，水浸州城西堤，城内居民惊慌万状。他不畏艰险，挺身而出，亲率佃户数百人，筑堤堵水二十余昼夜，物资费用由自己负担，共计布袋千余条，高粱秸数万束。大堤因而完固，州城得以保全，州民无不感恩戴德。

5、施药拯危：他为解除乡邻贫困者无钱治病的痛苦，不惜重金派人到外地购置上等名贵药材，并请名医高手配制成成品，有求必应，不收药费，历经三十余年，四方男女前来求药，全活者甚众。

6、施衣济贫：每年冬季严寒将届，他就预制棉裤、棉袄数千件，凡贫困无衣者衣之。三十余年未有间断。

7、施棺恤死：凡乡邻鳏寡孤独贫困无依无靠，死后不成葬者，经诉说后，他即派人到市制棺安葬，三十多年来习以为常，州人称之为“在世活佛”。

8、仗义焚券：凡乡邻贫困欠债无资偿还者，经他过目后，将债券焚烧，永不再讨，数年来计千金。

9、捐资修学：旧州学府舍，明末因黄水冲决，房屋片瓦无存。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他输资万贯，移建在新城内东门里路北，名为洛学书院（地址在今实验小学）。

10、尊崇师友，家教谨严：凡师友至家，皆敬如宾。教育兄弟子侄，均以耕读为业，训戒族中子弟勿干涉外事，勿持强凌弱，勿欺侮乡邻，要和睦相处等。